

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研究

郭 亮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重庆 400047)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earliest waist pit, around the late period of early Sang dynasty, was found in Beichun, Ya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During which time, this burial custom spread from central-plain area to the west and east bank of Yellow River, via Wei River, the Sang Culture as well as waist pit got into Shanxi province, or even as far as Gansu province. Through the connec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Shanxi, Henan, Gansu, a clear picture of the then social visage and ethical involvement could be seen.

Key Words: Shanxi Province Waist Pits Burial Custom Central Part of Henan Province
Eastern Part of Gansu Connection

内容提要 现有资料表明,陕西地区腰坑葬俗最早发现在耀县北村,时代约在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同一时期,河南地区的腰坑葬俗已经开始由中原向黄河东西两岸地区伸展,传统的殷商文化借助渭河之便进入陕西,并把腰坑墓这一葬俗带给关中地区,乃至甘肃陇东地区。由此,全面了解腰坑葬俗在陕西关中、河南豫中、甘肃陇东的联系与发展,对揭开当时社会的真实历史面貌以及民族的变迁演变提供了某些线索和资料。

关键词 陕西地区 腰坑 葬俗文化 豫中 陇东 联系

中图分类号 K892.22

文献标识码 A

前 言

所谓“腰坑”,指的是我国古代埋葬习俗中的一种形式,即在墓葬的底部靠近中央挖一个小坑,位于墓坑底部的棺或者是槨的下方,里面安置物品作为随葬,这些葬品可以是殉人、殉兽、陶器、青铜器、玉器,也可以是生产工具、契约、钱币等等。从目前我国考古资料及考古发现的腰坑葬俗资料来看,这一独特的葬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流行于商周,战国中期以后逐渐在北方消亡,尤其体现在黄河流域上游的陕西地区,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情况分析:从西汉以后,已不见腰坑现象,而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的腰坑葬俗则还有发现。相比于北方黄河流域腰坑葬俗的逐渐消失,南方长江流域的这一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贯穿始终,直到明代还十分流行,但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西南地区,包括长江三峡地区、重庆、贵州、云南等地区^[1]。

我们再从腰坑墓葬的分布地域上看,商代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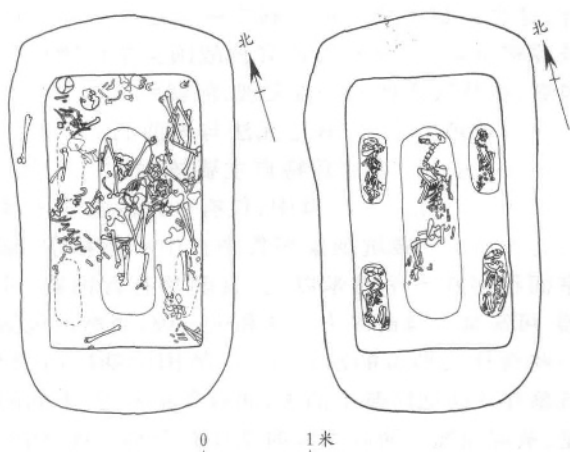
坑墓主要分布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期主要分布在以陕西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地区。商、西周作为先后衔接的两个朝代,二者腰坑葬俗的演变和发展是有必然联系的。那么,陕西地区的这种葬俗是何时出现,又终于何时呢?它是怎样在陕西出现?其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它又对河南、甘肃的腰坑葬俗产生何种影响呢?以上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的发现

(一) 商代腰坑资料

商代腰坑资料在黄河流域非常丰富,商代前期即武庚迁殷以前,腰坑墓只局限在现今的河南地区,但从商代后期开始,腰坑墓的分布范围开始遍及整个黄河流域(青海地区除外),陕西成为仅次于河南发现腰坑墓数量最多的地区,发现地点包括西安、长安、铜川、泾阳。就笔者所掌握材料,以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腰坑墓为例,介绍如下。

1. 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该遗址以郑州二



图一// 西安老牛坡 M6 腰坑墓示意图

里岗为参照单位,文化层分为三期,墓葬出现在第二、三期,“第二期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或稍晚,属商代前期偏晚阶段;第三期约相当殷墟二期或偏早,属商代后期偏早阶段,即盘庚至祖甲时期。”^[12]在这些墓葬中,墓底中央多有长方形腰坑,其中埋狗。经对比研究,墓内出土器物与郑州、殷墟等地的遗物基本一样,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也是整个陕西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腰坑资料。

2. 西安老牛坡商墓群。1986年,该遗址共清理出38座商代墓葬,其中32座设有腰坑,比例高达84.21%,长方形为普遍形制,坑内多埋狗,也有腰坑殉人现象。编号M6墓底中心腰坑中殉1人,侧身屈肢,左上臂压于头下,除此之外,四角还设有角坑,各殉狗一只(图一)。至于墓主身份,上至奴隶主贵族,下到平民阶级。墓葬年代被定为商代晚期^[13]。

由此可知,自殷商中期以后,在今天的灞河流域沿岸已经依附一支强大的商文化势力。从墓葬的形制、殉人风气及出土器物来看,它与安阳殷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即在商末周初之际,商文化势力逐渐伸展到泾渭流域。但这些商墓的发现多都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排列异常紧密,并未在整个陕西地区遍布开来。据学者研究,认为西安、长安、铜川三地的文化遗存,在当时属于殷商的边陲地带,是作为商王国与各方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而存在的。如刘士莪先生结合古文献记载,认为老牛坡商代墓地可能与商代的崇国或西土三亳之一有关^[14]。

(二) 西周腰坑资料

西周时期的腰坑墓在整个黄河流域发现依然很多,除青海地区外,黄河流经的各个地区都有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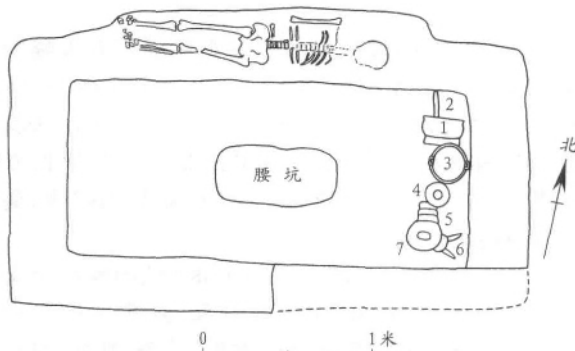
置腰坑的现象。其中以西周政权所在的陕西关中地区数量最多,陕西地区的腰坑葬俗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顶峰。从所发现的腰坑墓资料中归纳,可知早中期的腰坑资料最为丰富。鉴于商代中期以后,传统殷商习俗在关中地区逐渐传播开来,承至商末,随着周人势力的东进,其文化必定会同盘踞在沔河以东的灞河流域、泾河流域的商文化产生碰撞,相互影响。在周人代商后,多少沿袭了殷商传统习俗,腰坑葬俗便是其中一种,其范围主要分布在都城镐京一带,还包括扶风、泾阳、铜川、宝鸡等地。

如在沔西马王村白家堡子村北、张家坡东南发掘出土的31座西周墓葬中,16座设有腰坑,所占比例51.61%。腰坑形状以椭圆形为主,腰坑内多以殉狗(图二)。从随葬组合看,墓主身份分武大夫、下大夫、平民三等。年代属西周初期^[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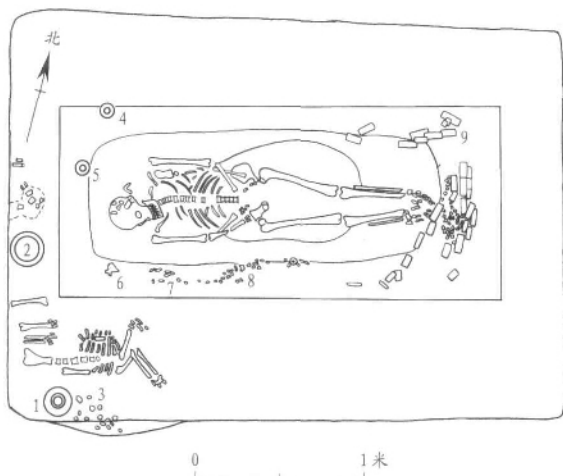
在沔东普渡村丰镐遗址中清理出土的44座墓葬,17座见有腰坑,比例占38.64%。编号M18,腰坑平面呈椭圆形,坑内殉狗(图三)。墓群时代跨越整个西周,墓主身份依次为小奴隶主贵族、下大夫、平民三个等级^[16]。

在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村清理出墓葬20座,腰坑墓12座,比例达60%。腰坑形状以长方形、圆形为主,坑内多殉狗。随葬品包括成套铜兵器、铜礼器等,墓主身份可确定为贵族阶级。腰坑墓时代早晚期都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0座墓葬早晚期间曾经存在着一个手工业堆积层。经考古研究,确定其为骨器作坊遗址。因此可知该地的文化发展序列为:墓葬(早期)——骨器作坊(中期)——墓葬(晚期)^[17]。

对于泾阳、铜川二地,虽然腰坑墓数量不及上述三地,但其在腰坑形制、埋藏物等方面与之出入不大,故在此不做赘述。然宝鸡茹家庄发现的一例西周腰坑墓非常奇特,这是由两座规模较大的墓葬组成,都有一条斜坡墓道。其中编号M1的椁室



图二// 沔西西周墓 M106 腰坑墓示意图



图三// 沔东西周墓 M18 腰坑墓示意图

分为甲、乙二室,在 M1 乙底部中央有一方形腰坑(图四),尺寸不详,坑内殉狗。葬具为内外重棺,随葬铜器百余件,其中 13 个铜器上刻有铭文“𠄎伯自作用器”,显示墓主身份为𠄎伯。《礼记·士丧礼》记载:“天子三棺四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𠄎伯身份相当于大夫等级。墓葬时代为昭王至穆王时期。此外 M1 甲和 M2 经分析研究,墓主身份当为𠄎伯殉妾和发妻,且夫妻合葬和同穴殉葬形制尚是首次在陕西地区发现^[8]。

以上考古资料表明,西周时期仍十分流行腰坑葬的习俗,其分布范围与商代相比不断扩大,在原有基础上向西边的丰镐、周原之地逐步发展。而在数量上,陕西地区西周的腰坑数远远多于殷商时期的腰坑数。根据对这些西周腰坑墓资料的分析,中小型墓普遍流行这种葬俗,大型墓中则基本不见腰坑设置现象,且设置腰坑的墓地亦多集中在特定区域,而周边地区则不见这种葬俗。如陕北地区、陕南地区等。这与殷商时期凡墓葬大部分有腰坑的状况是有明显有区别的。

(三) 春秋战国至秦代腰坑资料

这一时期的腰坑葬俗数量在全国都有大幅削减,在陕西地区仍有一些发现,多集中在西安、咸阳二地。如 1974 年,西安户县发掘出部分春秋前期的秦国墓葬。其中编号 M3 底部有一圆角长方形腰坑,坑内殉狗。从殉葬物、车马器和殉奴看,墓主当为高级贵族^[9]。

在咸阳塔儿坡发掘出土的 381 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中编号 M18040 的洞室墓,其腰坑设置在死者人骨架下方,平面呈长方形,内置陶釜、陶壶各 1 件,墓主为一般富有者。骨架葬式为仰身屈肢

葬,这也是目前所掌握资料中陕西地区唯一的屈肢葬腰坑墓^[10]。从现有的春秋战国至秦代腰坑资料看,虽然陕西地区仍有发现,但就所发现的腰坑数量以及范围来说,其已无法与先前的商周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墓葬特点主要体现在:1. 数量少,范围小。在一个墓群中,仅有个别的墓中发现设有腰坑;2. 腰坑现象多集中在中小型墓中,墓室面积多在 5 平方米以上,且随葬有青铜器、礼器,可知墓主身份多为贵族和士一级,当然也包括一些有社会地位的富有者;3. 战国中期以后,腰坑墓在陕西地区基本消失,偶有零星发现。不同的是,黄河流域下游在西汉时期还有个别发现。如山东蓬莱发现西汉早期腰坑墓^[11],山东济宁发现西汉中期偏晚阶段的腰坑墓^[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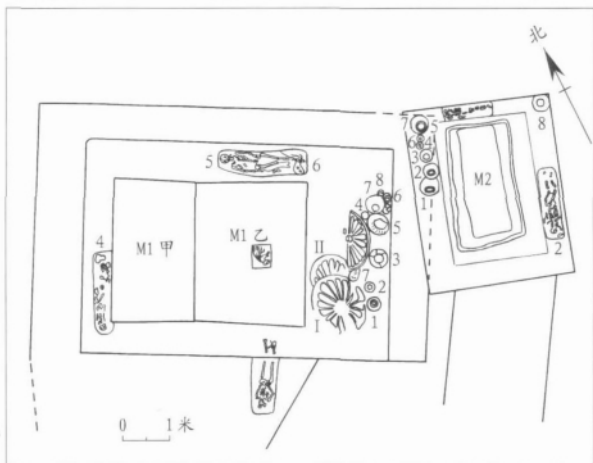
二 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 陕西地区腰坑墓葬的始终时间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腰坑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偏早阶段在陕西地区并没有发现腰坑葬俗,在铜川耀县北村的商代早期偏晚阶段的腰坑,是迄今为止陕西地区发现最早的腰坑墓,年代距今约 3300 多年;其次以商末的泾阳高家堡的腰坑墓时间为最早,距今约 3100 多年,腰坑墓的强势阶段发生在西周早中期,时间距今约 2900 多年,春秋至战国中期,腰坑墓葬仅有零星发现,距今年代约 2300 多年,自秦汉以后,腰坑葬俗走向消亡。

(二) 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的综述及地区分布

1. 商代晚期至末期。商文化在占据伊洛平原后迅速向西发展,如 1997 年,发现的商洛东龙山夏商文化遗址,其出土的陶器面貌总体上与二里头遗址大体一致。且在属于商代二里岗时期遗存中,发现的陶器面貌也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相近。



图四// 宝鸡茹家庄 M1、M2 腰坑墓示意图

与此同时,在陕西耀县北村发掘的商代遗址内,亦揭示出商文化在渭河北岸的西进过程。截止目前,已知陕西境内的商文化往西深入可达今天的周原一线,在华县、蓝田、耀县、沔东、西安老牛坡、周至、礼泉、扶风、岐山等地相继发现了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商文化遗存^[13]。在这些发现地区中,目前仅在灞河流域的西安地区,泾河流域的泾阳高家堡、铜川西边的耀县北村发现有腰坑葬俗,而在其他地区基本不见。

2. 商末至西周中期。这一时期的腰坑葬俗在陕西地区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同时也与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进行相互的交流影响,例如陕西西部与陇东相交地带,就受到了陇东以西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甘肃安国式文化)因素的波及,在宝鸡竹园沟等地的西周墓葬群并未发现腰坑,相反,周人也将自身的传统文化传入甘青少数民族区,进而“反映了西周时期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14]。同样的现象也体现在陕北地区,因受到河东山西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故也未发现腰坑资料。

纵观整个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腰坑墓葬,其多集中在西安长安区的沔西地区,并以此为圆心,向四周波及,北至泾阳、铜川,东达沔河以东,南依西户铁路沿线,西临宝鸡。当中又以沔河以西的张家坡地区的数量及规模发展到了顶峰。其次以西安与宝鸡之间的扶风地区发现最多,铜川地区次之。

3. 春秋战国至秦代。目前资料表明,这一时期腰坑葬俗多在陕西的咸阳、扶风、户县、凤翔四地,数量远不及前代。而西周时期腰坑墓的大户张家坡地区,自春秋中期以后竟然不见一例。且出土腰坑墓的地区,腰坑墓在墓群中至多不过一两座。为什么盛极一时的腰坑葬俗在这一时期濒临消亡呢?据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与秦人占据西周故地相关联。秦国原为周之附庸小国,僻处雍州,因平王东迁时护驾有功,得以受封诸侯,授予岐周之地(当时为犬戎所占据)。传至穆公,国力渐盛,灭十二戎国,开地千里,成就西戎霸业。自此,岐丰故地尽为秦有。在获得西周故地之后,秦人仍以周文化作为传统,但同时也将西北少数民族的某些习俗和宗教观念带入了关中地区。例如,秦人盛行的屈肢葬开始影响整个关中地区,边箱、小龕等的出现加快了腰坑葬俗覆亡的进程。

(三) 墓葬腰坑形状

商代中期至末期,陕西地区的腰坑形状以方形为主,这与河南地区的腰坑形制出入不大。不同的是,陕西地区的腰坑还呈椭圆形,西周时期,腰

坑的形状在方形基础上又添加圆形,而河南地区的腰坑形状未发生重大改变,依然以长方形为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腰坑形状又以圆角方形、长方形为主,而之前的圆形、椭圆形业已消失。再者,就整个的腰坑形状看,当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腰坑形状最为规整,西周的腰坑形状次之。

(四) 墓葬中设置腰坑的用途及殉葬品的演变

通过前面资料的介绍,陕西地区墓葬的腰坑所出土的随葬品包括:殉人、殉狗、殉兽、殉禽、铜铃、贝、石戈、釜内戈、玉蚕、玉圭、玉管、石圭、陶釜及陶壶。按腰坑的时代发展序列可分为:

第一,商代晚期腰坑内所葬之物有殉人、殉狗、石戈、釜内戈、玉管。殉人和殉狗之风,当是从河南地区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传播过来。狗是一种善于警戒的动物,殉人、殉狗的寓意当是为死者警卫,铜铃为狗之饰链;玉管、石戈、铜戈是象征墓主身份之物,可能是从墓主身上跌落所致;贝的用途可分两种:一则亦是狗之饰物,二是当钱贝之功效,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

第二,西周至战国的腰坑葬,坑内仍以殉狗为主,其他还发现不明动物骨块、贝和玉器。根据周边地区墓葬情况分析,这些不明动物骨块仍以殉狗者居多,而禽骨的出现,则体现了当地土著民族不同于商文化的习俗、特点及宗教信仰。另外,由于棺槨极度腐朽之缘故,随葬墓主身旁的玉蚕和玉圭出现在腰坑内不足为奇。

第三,战国中期以后,在塔儿坡的腰坑内发现陶釜、陶壶,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器,在陕西地区腰坑中尚是首次发现,亦是唯一的范例。这表明腰坑的性质已发现根本改变,其已经从一种信仰习俗演变成为真正的墓葬随葬品,同时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虽然南方长江三峡地区腰坑葬俗中常置陶器等生活用具,但在这个时期,此现象还未出现。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

殷商、西周时期普遍在腰坑内殉人、殉狗,这是明显区别于南方地区腰坑葬俗的地方。防鬼神趋盗扰之意无错,但其具体含义又是怎样的呢?殷商时期,墓葬的建筑多摹仿地上的宫殿、宗庙和住所那样,在墓底中央设置类似于“奠基坑”的殉葬坑——腰坑,其内多置狗和人。这种殉人、殉狗现象,如前所说,其用意为辟邪护主,防鬼神侵扰,以保护墓主在阴间的正常生活。且腰坑作为整个墓室的底部中心,也起着在墓葬开工前进行奠基祭祀的作用,这与地上建筑异曲同工。如殷商统治者在建造宫殿庙宇前,常在门址下的基槽中殉人和

狗,以示奠基。“门旁及门前的跪着的人等,当系房屋的保卫者”、“奠基的狗和守卫的人,是与建筑的程序有关,多系一次埋入。”^[15]这些在建筑宫殿庙宇仪式上所杀的人和狗,用意是为了防止夜间鬼神的骚扰。而腰坑墓无非是殷商统治者将地上的那一套奠基祭祀仪式搬到地下。关于古代盛行用狗祭祀和丧葬的风俗由来久已,《礼记·曲礼下》云:“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说文》:“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段玉裁案:“羹之言良也,献本祭祀奉犬牲之称。”可能古人认为狗肉做的羹很美,便奉以祭祀神灵或祖先。夏代二里头遗址唯一的大墓发现一个用漆朱木匣装的完整的狗骨架。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及用做他途外,大量的被用于祭祀或丧葬,狗也不例外。西周早期的中型墓中,有的将牲畜放在一起,表明人们将牛、狗等肉食动物献给死去的亲友。秦国在春秋时期就有在四方城门杀狗御灾的风习,《史记·秦本纪》:“磷狗邑四门,以狗御蛊”。汉代乃至以后仍盛行此俗,民间喜杀白犬祭祖。《风俗通义·祀典》卷八说:“杀狗磔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详”。《四民月令》载:当时的宗族十一月便要“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正月则“收白犬骨及肝血”……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磷狗御蛊”、“驱鬼辟邪”之信仰。

(五)从腰坑墓的演变探索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及腰坑墓的族属问题

1. 人们思想的第一次变化

探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首先来比较下陕西地区与河南地区在同时期内腰坑墓的不同。以西安老牛坡商墓群为例:第一,与殷商地区腰坑墓在底部还设有祭祀坑(或奠基坑)现象不同的是,老牛坡的腰坑墓墓底在四角另设有角坑以及头坑和脚坑,这现象在殷商墓中是不见的;第二,老牛坡腰坑墓群中发现有侧身屈肢葬,这亦是殷商墓中没有的;第三,老牛坡墓地所出土的陶鬲别具风格,与殷商的迥异。从以上的分析看,以老牛坡商墓群为中心的陕西地区发掘出属于郑州二里岗的文化遗迹和遗物,表明商文化与西安一带有着密切联系。而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又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同类型器物在形制、纹饰风格上如出一辙,是典型商文化的产物。但二者在陶鬲上的不同以及在腰坑内设置的差异,表明老牛坡文化带有明显的二重性,它的主体源于郑州二里岗殷墟文化,同时又融会若干地方的文化因素,并且兼有与秦岭以南汉水流域商文化接触的迹象。这些都说明了 3000 多

年以前,关中地区已是商王朝势力所波及之地,或者为商王朝的直接管辖区,或者为商王朝的封国所在。有学者研究“在当时,崇国的势力颇为强大,崇侯虎曾谮西伯(文王)于殷纣,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可知崇是周势力东向发展的最大障碍,周文王为了完成‘翦商’大业,最后‘伐崇侯虎而作丰邑’,可见丰邑所在应是崇国的势力中心地。现知丰在今长安沣西张家坡一带,距老牛坡约 50 公里。虽目前尚无更多旁证以说明崇国东西的势力范围,但老牛坡一带为崇国势力所及地区是完全可能的。”^[16]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尚无定论,在此我们且不论它到底归属哪国,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是作为商王朝的一个封国存在的。那么,族属问题也趋于明朗,商时陕西地区的腰坑葬俗来自于中原殷商文化,而二者的区别则正反映了陕西地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即周人在与殷人交往中,吸收了墓底设腰坑的做法,并依据本民族习俗做了少量调整。

2. 人们思想的第二次变化

武王灭纣之后,关中地区传统的商文化,在糅合先周文化后,逐渐形成西周文化。商文化在西周时期亦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我们从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的变化可探出端倪。在西周中期以前,由于传统商文化根深蒂固,使得腰坑葬俗不减反增,尤其表现在中小型墓中,大型墓则未有发现,且腰坑内殉人现象已不见。除此之外,西周时期的腰坑与商代腰坑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

第一,西周时期的腰坑墓多集中在早期和中期,晚期的比例所占很小。

从表一我们可看出,西周早中期的沣西地区是腰坑墓盛行之地,所占比例均在 50% 以上,这与殷商晚期腰坑墓的 60% 相差不大。因此,在灭商之初,陕西地区腰坑葬俗是以殷遗民为主体,包括部分长期受商文化影响的本土人。在这片殷遗民与周人共同生活的地区,前者仍继续保留着设置腰坑的习俗,而后者当中与前者亲密接触的部分人亦出现腰坑葬现象,至于大部分周人则依旧遵循着本族的传统葬俗,在墓葬中未设置腰坑。这一相同现象在整个黄河流域(青海省除外)都有发生。例如殷商以北的今北京市区及周边地区,在当时为商末周初之际的燕国封地,这里居住着大批殷遗民,他们可能是原来统治北方的殷商诸侯或者其部属。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可断定北京房山琉璃黄土城遗址的 60 余座墓葬为殷商晚期至西周中期。这些墓葬被划为 I 区、II 区, I 区内皆为中

表一// 陕西地区西周早中期腰坑墓资料

地 点	时 代	腰坑墓	比 例
陕西陇县店子村	西周初年至成康时期	3	75%
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村东、东南	西周初期	16	51.61%
陕西长安沣西	西周初期	27	58.70%
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张家坡	西周前期	6	54.55%
陕西扶风黄堆公社云塘村	西周早、中期	12	60%

小型墓葬,墓底设置腰坑,殉人、殉狗现象比较普遍,但在Ⅱ区墓葬内,无论大小,设置腰坑及殉狗现象很少见,殉人现象也已消失。再从随葬的器物组合来看,Ⅰ区的陶器类型、纹饰等与安阳殷墟的腰坑墓基本相同,而Ⅱ区内则有大型姬姓燕墓以及中小型墓葬,精美、珍贵的青铜器都出土于此区。针对这一现象,有研究者认为:“由黄土坡墓葬西区歧义想象,Ⅰ区殆是原殷遗(民)的墓葬,其中没有大墓。Ⅱ区是贵族墓地,都已不再遵循殉人殉狗的殷商风俗。”“如果Ⅱ区包括随周公北来的周人及东方旧族,Ⅰ区则是保持殷商文化的普通人民。”^{117]}与此情况相同的河北满城要庄遗址所发现的100余座西周中期墓葬,小型墓葬设置腰坑,其随葬的陶器组合(鬲、罐、簋、豆)与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的殷遗民葬俗及陶器组合相同。故“要庄是西周时期燕国南境另一处政治中心和居民点”^{118]},由此推知,墓葬群体中有相当的部分属于殷遗民。

第二,在发现的腰坑墓葬中,相当数量的腰坑内不见任何随葬物品和遗迹,这也是不同于殷商地区的奇怪现象。如《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列举的398座西周墓中有腰坑者33座,但其中22座腰坑内空无一物,与传统埋狗习俗相比,西周中期以后的殉狗多置于二层台上或填土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笔者认为,腰坑葬俗从殷商传至陕西地区,逐渐失去其奠基祭祀之义,特别是中小型墓中殉狗仅做辟邪防鬼护主之效。且殉狗位置的转移,表明其已从保护墓主的作用转变为保护整座墓室,以防止鬼神和盗墓者对墓室的骚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空腰坑中未发现动物骨骼

以及稻谷痕迹,但不排除因腐朽而导致的空无一物的现象。以上这些都表明:殷遗民正逐渐被周文化所同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第二次改变,导致西周晚期腰坑墓数量的锐减。如表二所示,这一时期的腰坑墓比例未达到25%以上,在这些稀少的腰坑内多见殉狗,而之前的空腰坑墓几乎消失。故结论就不难推测,这些空腰坑墓的主人当是与商文化接触较密的周人,而商遗民则一直延续着本民族设置腰坑内埋殉狗的习俗,在周文化越来越强大之际,受商文化影响较强烈的地域正在不断缩小,腰坑葬俗也随之江河日下。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相当一批商殷遗民后裔也逐渐地放弃了这种在墓底挖坑殉狗的传统埋葬习俗。

3. 人们思想的第三次变化

腰坑墓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只是商周以来传统腰坑葬的苟延残喘,并且随着带有少数民族民风的秦人入主关中,更是给予这一葬俗以毁灭性打击。如屈肢葬的盛行,壁龛取代腰坑,洞室墓的出现,殉狗转变为生活日用品等等。尤其是陶器等生活用品的采用,使得人们的思想已从御鬼神防盗扰,转变为对死后生活的追求。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腰坑葬在陕西地区属于孤例,就目前资料来看,无可厚非,但若结合整个黄河流域看则不然,如前述的山东的两例汉代腰坑墓,它们的腰坑内分别放置着陶罐和陶瓮。以上变化正反映了人们思想的第三次变化。

4. 人们思想的第四次变化

秦汉以后,陕西地区已不见腰坑墓葬,这是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结果分不开的。

表二// 陕西地区西周晚期腰坑墓资料

地 点	时 代	腰坑墓	比 例
陕西扶风黄堆老堡	西周中晚期	1	9.1%
陕西扶风上康村二号墓	西周晚期	2	25%
陕西扶风云塘齐家村	西周晚期至西周末期	3	21.43%

秦汉时期是中国墓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商周以降的竖穴木椁墓转变为横穴式封闭的砖石墓,同时也昭示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形成^[19]。墓葬制度也已从贵族生前社会等级地位的变化转变为对当时或身后社会的世界观的认识。且随着壁龛的出现,腰坑逐渐失去自身原有价值,它的覆亡尚在情理之中。

三 探索陕西地区腰坑葬俗与甘肃、河南地区的联系

以上所列举的考古资料表明,陕西地区的腰坑葬俗始于河南地区,那么甘肃地区的腰坑葬俗是由陕西传入的吗?以下,笔者就所掌握资料浅析三者之间在腰坑葬俗之间的联系。

甘肃腰坑墓葬的集中区域包括灵台、庆阳、泾川、礼县、宁县、崇信等地,主要发现于陇东地区,而河南的腰坑葬俗则以安阳、洛阳为主体。由此,我们可将以陇东、关中和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进行比较说明。

首先来说甘肃地区,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甘肃永登蒋家坪发现一座属于马家窑第四期马厂类型的大墓,距今约3900年,“其人骨架下挖有长方形深坑,坑内分层埋猪、狗四只,人骨一具,人头一个……这老年女性应属奴隶殉葬,少年的头骨乃是人祭的遗留”^[20]。这个深坑是否是腰坑,学者争论不一。不过,若结合其在人骨架下,且坑内所埋之物有可能作殉葬、祭祀之用,这就与中原河南地区传统腰坑墓中殉狗、殉人现象极其相似。而在殷商墓也发现形制如此之大的腰坑墓,如在河南安阳后岗商墓群中,编号M32墓底设有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腰坑,长1.94、宽0.81、深0.63米^[21]。故此笔者暂将这一长方形深坑归为腰坑。虽然它是黄河流域乃至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腰坑墓,但相同情况在甘肃其他地区未有发现,是为孤例,因此就谈不上它与以后的甘肃和陕西地区的腰坑葬俗有何渊源了。

再看河南地区,笔者认为,典型山东龙山文化对河南地区的腰坑葬俗出现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城墙、地面的基槽中常发现置有填土,且填土中多发现完整的人骨架及动物骨架,其祭祀奠基的作用不言而喻。这种用狗作祭祀的牺牲与商代殷墟地区建筑宫庙时的殉人、殉狗现象基本一致。宋镇豪先生曾撰文提到:“商代墓腰坑内奠犬牲的葬俗,可上追到仰韶及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汉地区和东部滨海地区。如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一期墓葬发现有5墓共殉6犬。山东大汶口文

化时期墓葬用狗殉葬更为多见……殷人当沿袭了前代的这种丧葬风习”^[22]。

由此可见,葬狗习俗自大汶口开始,经过典型龙山文化逐渐发展成熟起来。随后的河南王湾三期文化在其城墙遗址的夯土中发现一圆形奠基坑,埋有成人和儿童骨架。对于王湾三期文化是否发展为二里头文化,学术界还存有疑问。我暂将二者看做一个系列阐述,到了夏商之际,中原地区将这一习俗引进到自己的宫殿建筑以及墓葬之中,并逐渐产生了拥有自身特点的墓葬——腰坑内埋狗殉人。如河南偃师二里头^[23]出现的腰坑葬,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最早的一例。商代早中期的二里岗文化中的腰坑葬,经研究是在二里头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的,且这一时期的腰坑葬习俗在河南地区开始流传开来,如河南郑州二七路^[24],河南许昌大路陈村^[25],河南郑州白家庄^[26]等地。但同样现象在陕西并没有出现,直到商代前期偏晚阶段,陕西地区才出现第一座腰坑墓葬。而陇东地区最早的腰坑墓发现在泾川、崇信二地,时代也比关中地区的腰坑墓晚(表三)。因此,我们可以将商、西周时期的豫中、关中、陇东地区腰坑的发展序列及演变用下图表示:豫中→关中→陇东。为何墓葬中埋狗的腰坑习俗首先出现在中原地区呢?这是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由于文化信息及交往的疏密程度和文化联系方向的不同,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华山为中心的面向亚洲腹地和以泰山为中心的面向海洋的两大历史文化区。以伊洛—郑州为主的地带是这两大历史文化区的频繁接触的场合,更是它们进行文化角逐的中心。这一文化地理上的优势,当是使伊洛—郑州地区最早迈入门槛而成为东方古代文明发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27]。

除此之外,表三还告诉我们,于家湾的腰坑墓其在形制和殉葬物上与殷墟地区相同,且“墓主人身上涂朱砂,髑下有腰坑,坑内殉狗等现象都不是该地区本身所具有的。”^[28]可见此墓地可能为商王朝方国分封之地,加之出现时代晚于陕西地区,无不证明甘肃腰坑东来说法,其腰坑形状又以方形为主,与河南地区相同,而泾川地区则可推测为先周民族的栖居之地。它与陕西宝鸡地区先周民族栖息地一脉相传,略有差异,究其原因,是与陇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因素影响分不开的。如西周方国豳氏家族墓地发现的并叔墓。再者,从茹家庄、竹园沟(二地皆未见腰坑)墓地的器物可知,其一方面具有西周的典型性,另一方面又包含明显的甘肃寺洼—安国式陶器的特征,“这种共存现象反

表三// 甘肃地区商代腰坑资料

发掘地点	腰坑形状	放置物品	时 代	墓主身份	资料来源	备 注
甘肃崇信于家湾	长方形	殉狗	先周至西周	大夫、士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发掘不同时期墓葬 246 座,少数墓葬有腰坑
甘肃泾川	圆形	黑灰、木炭、红陶片、一块猪骨	先周	奴隶主贵族	《文物》1977 年第 9 期	1 座

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历史。^{〔29〕}加之先周地区腰坑多呈圆形、椭圆形,与殷商迥异,笔者认为这是先周民族腰坑所特有的形状。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陕西的扶风地区在其墓葬的随葬品中普遍发现有石圭,葬式也趋于屈肢葬,这些少数民族的外泊习俗应是由秦文化携带来的。可见陇东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因素也对陇东、关中西部的部分墓葬特点和习俗产生一定影响,如甘谷毛家坪遗址中的“A 组遗存”^{〔30〕},经考古调查,其后段为东周秦文化遗存,前段则与关中的周文化相似,但诸如屈肢葬、普遍随葬石圭等特点,并不见于西周文化,而是与秦文化相似。段连勤先生曾根据嬴秦族源为东方夷人以及对“犬丘”的论证,认为“嬴秦是西迁吠夷的一支。”^{〔31〕}《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秦之先祖居西陲犬天丘”。在水天出土的秦公簋证明秦人祖先长期活动在甘肃东南一带。1994 年及 1998 年礼县大堡子大型墓中殉人的骨骼经鉴定,其体质特征与甘肃史前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相同,拿之与史载“秦人东徙说”^{〔32〕}进行比较,可证明商周腰坑的归属并不属于盛行屈肢葬的陇东文化,而秦人上层统治者与下层平民可能不属同一个民族。在所发现的秦人墓葬中,秦人上层阶级的墓葬与下层社会的墓葬在规模、葬式、随葬品上有明显的区别。彭文先生认为:“在殷墟故地为统治者所逐渐抛弃的东西到了王朝中心以外地区,就又被当权者作为一种特权拥有了。”^{〔33〕}笔者是同意此观点的,随着春秋礼崩乐坏,权力逐层下放,非贵族墓中出现腰坑葬俗的现象并不为奇。这样,腰坑在秦文化中的演变可归纳为:传统中原的腰坑习俗被秦人西迁带入关中、陇东,且为贵族特权,经过长时间与少数民族的杂处交融,腰坑葬开始下移至平民阶层。而后随着平王迁都洛阳,秦人入主关中,直到一统全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秦文化如同它的国家一样强大,以陕西地区为中心,向周边不断扩散,并将带有多民族因素的秦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乃至南方的楚文化。

对于河南地区,该腰坑的发展可从两个方面

探讨:第一,殷遗民的势力依然强大。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说,整个西周时期河南地区发现的 9 处腰坑墓皆在洛阳地区,即王城和分封国都邑的周围,而在陕西东部及豫西一带尚无发现,这一段空白期是需要以后考古资料佐证的。西周中期以前,陕西地区的腰坑葬俗对河南地区的腰坑葬俗几乎没有影响,虽然中原地区变成了周王朝的分封国,最高统治者也来自姬姓,但传统的商文化及商遗民的影响根深蒂固。故传统的腰坑葬俗得以保存下来,且具有周民族特点的圆形、椭圆形腰坑在此始终未曾出现。当然,周人在接受殷商文化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习俗,如西周中期以后,腰坑葬俗开始减少,只在洛阳的白马寺、东郊和中州路有少量发现。第二,地方性因素日趋强烈及秦人的征服。传至春秋战国,东周王朝礼崩乐坏,国家四分五裂之中,诸侯割据争霸,严重阻碍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偌大的河南地区就融会了传统周文化、北狄燕文化、东夷齐文化、南夷楚文化,这就使得河南地区腰坑墓消失殆尽。加上最终脱颖而出的秦国,在武力征服六国的同时,也将拥有多民族因素的秦文化带给了他们。如晋国墓地很少发现腰坑葬,且出现屈肢葬式。洛阳王城孙旗屯所发掘出的三座战国末期秦墓,特点表现为无腰坑、屈肢、壁龛^{〔34〕};《史记·周本纪》载:“周赧王五十九年(前 256 年)秦昭王灭西周”,“后七年(前 249 年)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秦”。自此,由于受地方因素波及和秦人习俗的影响,豫中地区的腰坑葬俗只在郑州、登封、韩城、新郑有所发现,作为传统腰坑葬俗的残余,其在北方覆亡的步伐将不可阻挠。

综上所述,陇东、关中、豫中地区之间的交流影响是相互的,这种现象已不再单纯地表现在腰坑葬俗上,它已上升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高度,关中地区作为其中的连接纽带,沟通着三者在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因此,探讨“陕西地区腰坑葬俗与甘肃、河南地区的联系”这一课题是很有意义的。

四 结语

通过上述对陕西地区腰坑葬俗及相关问题的介绍与综合探讨后,使我们对陕西地区腰坑墓葬的起源时间、分布范围、演变过程等方面有了大致清楚的认识:从商代中晚期开始,以河南为中心的腰坑葬俗通过渭河流域进入陕西,并逐步传入甘肃东部;西周时期,周人在接受传统殷商文化后,腰坑墓葬多分布在丰镐、周原之地,而墓地中腰坑葬数量的不均衡分布当是周人与殷遗民共同居住所产生的结果。随着平王东迁,秦人占据关中,秦文化得以在陕西地区广泛传播,并随着征伐六国蔓延至全国各地,使得腰坑葬俗在北方濒临消亡。值得注意的是,秦汉之后,中国北方已不见的腰坑葬俗,在南方三峡地区、西南地区继续延续,其时间之长最晚竟达至明代,甚至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见有这种葬俗,有着这么悠久的腰坑葬俗,这在北方民族地区中是没有的。

从腰坑的随葬品、殉葬物看,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如王陵、奴隶主贵族的腰坑墓葬中的殉人殉狗现象,体现了殷人所独有的宗教信仰及观念;而一般平民墓则多殉狗及其他物品。比之前者,平民腰坑墓中少了奠基祭祀之意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描绘出当时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一般社会生活情景。故而全面深入地展开对陕西地区腰坑葬俗文化资料的搜集、研究和探讨,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一地区民族变迁的演变发展历史,同时也为我们恢复当时社会的真实历史面貌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和重要线索。

- [1]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古代腰坑葬俗的考古研究》,《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室、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实习组:《陕西耀县北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 [3]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 [4][16]刘士莪:《试论老牛坡商代墓(提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考古》1984年第9期。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84年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9期。
- [7]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墓》,《文物》1980年第4期。
- [8]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 [9]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 [1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窑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 [11]王富强、闫勇、罗世恒、袁晓春:《山东蓬莱大迟家两座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3期。
- [12]李德渠、夏义勇:《山东济宁市玉皇顶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6期。
- [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1999年,第430~431页。
- [14]宝鸡市博物馆、渭滨区文化馆:《窑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5期。
- [15]石璋如:《殷墟最近之主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1、37页。
- [17]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
-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考古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 [19]陈淳:《当代考古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 [20]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岗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 [22]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年第3期。
- [2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许昌县大路陈村发现商代墓》,《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 [26]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 [27]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 [28]张长寿:《论宝鸡茹家庄发现的西周铜器》,《考古》1980年第6期。
- [2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 [30]甘肃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 [31]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5月。
- [32]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 [33]彭文:《从蜀墓腰坑的设置看巴蜀文化与关中文化的交流》,《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6期。
- [3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孙旗屯秦国墓葬》,《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